



↑宋朝民间祭灶的场景

年关，宋朝太学生忙什么？

顶乌纱帽吧？所以必须从中选拔。怎么选呢？还是要考试。

在南宋后期，太学生每月一小考，每年一大考，每四个月还有一次期中考试。成绩优秀，能从外舍生升为内舍生；成绩拔尖，能从内舍生升为上舍生；成绩一般，只能老老实实当外舍生。外舍生是永远也没有机会做官的，内舍生和上舍生想做官，也要等待朝廷的选拔。有时选拔人数太少，而够资格参与选拔的人太多，只能抽签。宋高宗的养子宋孝宗在位时，一千多名太学生里被选拔做官的只有七个人，剩下千余名学生只能继续等待选拔。个别学生成绩差，运气更差，一直在太学里待到七十多岁。

僧多粥少，做官太难，等不及选拔的太学生干脆去参加科举考试，一旦考中进士，马上光宗耀祖。

现在有两个问题需要解决。第一，除夕就是春节前夕，太学生怎么不回家过年？为何要在太学里祭神和祈祷？难道他们就不放寒假吗？第二，太学生都是文化人，文化人怎能如此迷信？怎么非要向上天祈祷呢？

先说第一个问题。宋朝太学是有年假的，但却没有寒假。每年春节、寒食和冬至，太学生各有三天假期。古代交通落后，从杭州到成都要走半年（当年陆游从浙江到四川上任，路上花了六个月），别说没有寒假，就算连放两个月假期，远路的学生也来不及回家过年。所以呢，他们只能留在学校过年。

再说第二个问题。宋朝太学生都是孔子门徒，孔子“不语怪力乱神”，不代表不相信怪力乱神。我们熟知的宋朝文化人，例如苏轼、朱熹、司马光、王安石、黄庭坚、秦少游，对神神鬼鬼都有点迷信。苏轼当地方官，一遇到大旱就焚香求雨。王安石晚年退休，还把住宅捐出去当佛寺。秦少游带着老母亲坐船经过洞庭湖，不能顺风挂帆，竟然在船头杀牲祭神，还写下一篇《祭洞庭湖神》的文章。连这些大腕都如此迷信，太学生祭神时摆三道果盘又有什么奇怪的呢？

看看那些与太学有关的宋朝名人。最有名的可能要数李清照，她十八岁嫁给赵明诚，当时赵明诚二十岁，正在北宋太学读书。李清照的父亲李格非不是太学生，但在太学当过老师——李清照八岁时，李格非担任太学博士，相当于现在的副教授。

李清照是婉约派词人，另一个婉约派词人叫秦少游，苏东坡的门生，也在太学当过老师。1090年，通过苏东坡推荐，秦少游当上了太学博士。不过这次推荐遭到了苏东坡政敌的抨击：“秦观素号薄徒，恶性非一，岂可以为人师？”秦少游这种道德败坏的人，怎么有资格去太学当老师呢？

其实苏东坡的门生不止一个在太学当老师。有一个叫晁补之的学生，在太学当太学正；另一个叫张耒的学生，在太学做太学录。太学正和太学录都是主抓风纪的行政人员，宋仁宗时期可由学生兼任，后来由专职官员担任。

苏东坡没在太学当过官，也没有当过太学生，但他却和弟弟苏辙一起在太学门口租过房。1061年，苏氏兄弟在京城参加一年一度的制科考试（相当于高级公务员选拔考试），为了能在一个好的学习环境里专心备考，在太学正门东南侧租了一所民房。

我们都读过田园派诗人范成大的名作：“昼出耘田夜绩麻，村庄儿女各当家。”其实范成大是南宋政治家、官居副宰相，他曾经对南宋太学进行改革，增加太学生当官的选拔名额。范成大有一个堂兄范成象，则在太学里担任太学录。

南宋最著名的豪放派词人是辛弃疾，他娶妻范氏，而范氏的父亲——也就是辛弃疾的岳父——名叫范邦彦，曾经是北宋末年的一名太学生。范邦彦在北宋没有当上官，北宋灭亡以后，此人官瘾未减，参加了金国的科举考试，做了金国的官。当然，后来他又投奔了南宋。（据新华网）

◇【假期制度】

太学过年不放寒假

◎【宋朝名人】

苏东坡推荐秦少游做太学博士



公元1250年，旧历腊月二十四，凌晨时分的杭州城一片漆黑，唯独西湖东岸不远处闪着点点灯光。灯光之中，人影憧憧。

那里是太学，南宋后期的太学。当时太学将近两千名学生，分处几十个斋，每个斋都相当于一个班级，而每个班级的学生都在祭祀灶神。对宋朝太学生来说，祭灶是过年以前最为隆重的一项集体活动。

◎【祭祀灶神】

祈求早日离开太学

祭灶是传统习俗，该习俗在现代中国仍有残留。北方民谣有云：“二十三，祭灶仙。”每年腊月二十三是祭祀灶王爷的日子。怎么祭呢？一般在厨房摆一供桌，供桌上摆些灶糖。灶糖又甜又黏，粘住灶王爷的嘴，让他上天述职的时候没办法打小报告。

宋朝祭灶有所不同，宋朝人要到腊月二十四或者二十五才会祭灶，在仪式上也比较丰富：除了摆灶糖，还要摆酒，还要撕下灶神的旧画像，贴上新画像，最后还要把旧画像烧掉，让喝过酒、吃过糖的灶神跟着那缕缕青烟直上云霄。

宋朝老百姓祭灶，有的在腊月二十四晚上进行，有的在腊月二十五早上进行。太学生祭灶却要赶一个大早，赶在腊月二十四凌晨。俗话说得好，无利不起早，太学生这么早就祭灶，说明祭灶能给他们带来好处。至少他们心目中，祭灶能带来好处。

宋朝老百姓祭灶，地点通常在厨房。太学也有厨房，甚至有好几个厨房。但是太学生人数太多，假如一千多人乌乌泱泱都去厨房，厨房再大也得被挤爆。所以他们只能分别在斋里祭灶，也就是在各自的班级里祭灶。

那三道果盘又有什么寓意呢？其中寓意跟谐音有关。大枣、荔枝、蓼花糖——枣、荔、蓼；早、离、了。太学生通过祭灶，希望借助灶王爷的神力，早一天离开太学。

◎【做太学生】

其实有各种优待

太学生为什么急着离开太学？太学难道不好吗？当然不是。宋朝太学对太学生其实有各种优待。

北宋前期本来没有太学，只有国子学。国子学是国立最高学府，但只招收七品以上官员（含七品）的子孙。小官和平民的孩子想上学，要么去私学，要么去某些州府兴办的地方官学。这样办学，社会阶层会越来越固化，既不公平，也不利于朝廷选拔人才。所以到了宋仁宗在位时，范仲淹搞新政，借鉴汉朝就有的太学体制，在京城建了一所太学。这所太学主要招收八品以下官员的子弟，但也允许地方官学推荐上来的优秀平民子弟就读。

北宋首都在开封，范仲淹新政时期建造的太学自然也在开封。最初招生人数很少，全校只有两百名学生。到宋仁宗快要驾崩的时候，太学生增加到了六百名。

范仲淹新政以失败告终，太学却保留了下来。宋神宗在位时，王安石搞变法，把太学当成培育和选拔人才的基地，太学扩招到两千多人，学生待遇也有所提升。根据考试成绩，太学生分为内舍生和外舍生。内舍生成绩好，免收学费，每月还有三百文的“添厨钱”，也就是饮食补贴；外舍生成绩稍差，只免收学费，没有饮食补贴。

宋徽宗在位时，蔡京主政，太学扩招到三千多人，分一百个班级，这一百个班级又分为上舍、内舍、外舍三个等级。外舍生免学费，无补贴；内舍生免学费，有补贴；上舍生不仅有补贴，还能参加每年一次的“升贡”考试，一旦通过这个考试，马上就有官做。

◎【离开太学】

意味着可以做官

进入南宋，国土面积小了，太学规模也小了。南宋初年，宋高宗和文武百官被金兵追着东奔西逃，小朝廷在河南商丘、江苏扬州、江苏南京、浙江宁波、浙江温州等地不断迁徙，连个落脚点都没有，所以没建太学。后来宋金议和，宋高宗把杭州改为临安府，杭州成了实际上的首都，开始着手恢复太学。

衣冠南渡，人多地少，杭州土地尤其紧张，南宋的皇宫都非常逼仄，哪里有空闲土地建造太学呢？宋高宗有办法，他不是1142年（旧历1141年底）杀了岳飞吗？岳飞在杭州西湖东岸有一处住宅，被宋高宗收归国有，在1143年改建成了太学。

1143年南宋太学刚一建成，就招收了七百名学生。后来宋高宗当太上皇，太学生又超过了千人。到了南宋后期，太学人数稳定在一千四百人左右。理论上说，太学是宋朝皇帝在科举考试之外，第二个选拔官员的基地，所以这千余名太学生都有机会做官。可是这么多学生，不可能每人都给一



瑞金：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首演

瑞金是闻名中外的红色故都、共和国摇篮、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。

2019年5月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江西时指出：“要从瑞金开始追根溯源，深刻认识红色政权来之不易、新中国来之不易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。”回溯中央苏区史，我们可以探寻到中国共产党执政和国家制度建立的源头。

1931年11月7日在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，宣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，中国共产党在瑞金开始了治国理政的伟大预演。党和苏维埃政府开始了制度建设的伟大探索，为新中国的制度建设奠定了重要基础。

党和苏维埃政府建立了工农民主政权。苏维埃给予一切被剥削被压迫的民众以完全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，工农劳苦群众取得这样的权利，这是历史上的第一次。对此，毛泽东盛赞：苏维埃政权的民主发展到了这样的程度，实在是历史上任何政治制度所不曾有的。

党和苏维埃政府对文化教育高度重视，建立了免费的义务教育制度。

党和苏维埃政府还组织了识字委员会总会、分会和识字小组，负责组织工农群众扫盲识字、学习文化。

党和苏维埃政府将反腐败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列入议事日程。

为严明法纪，1933年12月，临时中央政府颁布了《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训令》，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所颁布的第一部反腐败法令。据统计，仅在中央机关就严厉查办了贪污分子42人，有力地打击、惩治了腐败分子，有效地遏制和预防了腐败行为的发生，增强了广大干部的廉政意识。

至1934年5月，苏区的贪污浪费现象基本上得到了遏制和肃清。正如中央审计委员会发布的审计报告中所讲的：“我们可以夸耀着：只有苏维埃是空前的真正的廉洁政府。”（据人民网）

周恩来：直接领导爱国卫生运动

1952年1月下旬，丧心病狂的美国侵略者在朝鲜战场发动大规模细菌战，连续在朝鲜以及我国东北、青岛等地投掷带有鼠疫、霍乱、脑膜炎、副伤寒等多种病原体的昆虫30多种，在当地引发许多以前没有发生过或很少见的传染性疾病，并在污染区造成流行态势，对平民百姓的生命健康形成巨大威胁。

获得情况反映和毛泽东有关“请周总理注意此事，并予处理”的批示后，周恩来随即拟定行动计划，采取应对措施。通过化验病菌、向国际社会控告帝国主义的罪恶行径、在全国进行防疫动员、争取国际合作等形式，“发动反对美国进行细菌战的活动”。3月14日，周恩来主持政务院会议，成立中央防疫委员会，亲自担任主任，部署在全国范围开展人民防疫运动。

3月中旬，他以中央防疫委员会主任的名义，先后发出《反对细菌战的指示》和《关于加强防疫工作的指示》，划定防疫区域等级，因地制宜，督促加强领导，做好群众宣传工作，相关工作一直“坚持到秋后”。

在“将敌人的细菌战粉碎”的同时，周恩来就“把我们的卫生工作借此提高一步”摆上了议事日程，努力化疫情危机为开展群众性的爱国卫生运动的契机。1952年12月11日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召开，周恩来到会作报告，强调对于卫生工作不能有丝毫松懈，必须把爱国卫生运动坚持下去。阐明卫生工作必须与群众运动结合，如果不与群众运动结合，卫生“工作面向工农兵”“预防为主”“团结中西医”的三大原则，就不可能很好地得到贯彻，并将“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”加入卫生工作的方针之中。

12月31日，周恩来签署了政务院《关于一九五三年继续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指示》，决定1953年在全国范围内继续开展爱国卫生运动，还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将中央防疫委员会更名为“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”。自此，新中国群众性的爱国卫生运动，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，开始步入正轨，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蓬勃景象。（据人民网）